

# 孤独的探索与前进

## ——民国佛教小说创作及理论初探

刘志权<sup>\*</sup>

〔摘要〕 通过梳理民国佛教小说的创作及理论研究,将民国以来佛教小说的发展分为民国初年至二十年代末的过渡期、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发展期和四十年代的开拓期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对佛教小说为数不多的理论进行了历时研究,并从现代文学及佛教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分析了佛教小说创作与理论没能同步发展的悖谬之处,旨在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佛教小说;佛教文学;现代文学史

—

立足于佛教的小说与佛教影响下的小说显然不是同一概念。佛教由于教理所限,对小说创作向未有关注,导致其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汉译佛典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已成共识,如胡适所言,它自身的文学性以及作为叙事文学的鲜明特点,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体裁、意境,提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并启发了后代弹词、平话、小说等的布局 and 结构。而佛教文学,则主要是佛传文学、赞佛文学(含本生)、譬喻和譬喻经、因缘经四类。在晚清以前,即便佛教界对自身的文学矿藏有所挖掘,也主要在于宣传佛教教义以及以白话讲宗教故事为主。佛教界创作意识的觉醒,则是晚清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与晚清以来梁启超首倡的“三界革命”尤其是“小说界革命”的推动有密切关系,故而佛教小说的观念革新,较之文学界的同类“革命”同质滞后,要延至民国初才出现。如谭桂林先生所言,现代佛教小说“从题材内容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创作小说,二是佛化小说,三是宗教纪实小说。”而“创作小说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类。这不仅是因为创作小说更能体现出小说文类作为叙事文学的虚构性特征,而且是因为在这类创作小说中,更能够反映出时代精神对现代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现代佛教文学家对时代精神文化变迁的感应与回响。”<sup>①</sup>

<sup>\*</sup>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10097。

<sup>①</sup> 谭桂林:《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正在出版之中,引文据电子文稿)。

20世纪以来,对佛教文学研究甚夥,从源头上看,得力于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对佛教的兴趣。这种兴趣又与西学东渐所滋生的“文学史”的自觉相结合。民国时期对佛典译介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敦煌俗文学的研究等,都自成范畴,为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佛教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孙昌武、龙晦、陈洪、陈允吉等为学者为代表;而谭桂林等则将佛教文学的研究范畴从古代拓展到“五四”之后乃至当代,尤其是突破了传统的“影响研究”,向内突进到佛教文学内部,向外则汇入“五四”启蒙主潮。经几代学者努力,佛教文学研究,已成显学。但与佛教文学研究的兴盛形成反差的是,民国佛教小说的研究则较为冷清甚至几乎还是空白。

相关研究明显的冷热不均本身值得思考。无论对佛教小说创作的成就作如何评说,唯有深入研究才能确认其是否具有价值,以主观忽视甚至“空白”代替了批评,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从现代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一方面文学史大厦的坚固与宏伟,有赖于其每个细部一砖一瓦的精细,面对晚清以来佛教文学思想深入参与现代启蒙思潮的现实,却不从其内部的佛教小说或其他体裁作细致的动态梳理分析,难免有失粗疏;另一方面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小说已经深入涉及社会各阶层平民的生活,却忽略了寺院丛林僧侣居士这样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对象,也多少体现了现代文学史的疏漏。

对佛教小说的研究第一步当从对佛教小说文本的搜集开始。当代学者的资料搜集工作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黄夏年的《民间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及《民间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是目前研究民国佛教期刊最为权威和全面的数据库。据估计,民国期间的佛教期刊应在200种左右,而上述两个数据库,前者搜罗了两岸三地佛教期刊148种209卷;后者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71种83卷,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所有民国佛教期刊。鉴于佛教小说(尤其是民初的)带着浓厚的旧小说的传统,本文循“创作小说优先”的原则,在择取“民国佛教小说”时作如下处理:1. 原刊直接标注为“小说”的,因为属于“有意为小说”,而且能从中看出对“小说”体裁的认识,所以基本保留(这也是辑录最多的)。2. 纯粹的劝善惩恶因果报应者的故事,或者只是对佛经故事、佛教人物的简单陈述,不作为小说,而章回体的演义,以及富有文学趣味的小故事,则视其文学性择优少量保留。3. 情节简单的志怪或谐趣文,或者流水帐式的记事文章,也不作为小说(对志怪是否作为小说,学界看法也不一),仅就其中有代表性者少量纳入,主要考量在于是否有情节、情感以及文采方面的有意经营。

如此,笔者共计辑得小说百余篇。无论是相对于该丛书浩大的体量,还是相对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学,整体比例无疑较低,但这是与小说在佛教文学中的实际地位是一致的。原因有三:一是清朝以来,由于政治箝制、国力贫弱以及战争等外部原因,以及长期“不立文字”主张以及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绮语”的偏见,佛教日益衰颓,遑论佛教文学;二是受制于赞助者的主观动机,佛教期刊出版的目的,多是向善男信女居士宣传佛教佛理,而由于佛教徒本身文化层次较低,因此,除了佛理佛经本身外,宣传更多是通过通俗化的故事来进行;三是即便落实到文学层面,古典诗词、小品散文也比小说更容易上手、耗时相对更少,也易于同好彼此传播。由是,相比社会上日益兴盛的晚清通俗小说以及立足于西方理念的五四现代小说,佛教内部的小说创作多少显出保守和变化缓慢的特征。

应该说,民国时期佛教与小说的关系,较之古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佛教早先是“小说”文体的“输入方”,而近代以降的小说,充分吸收西方小说及至近代科学的养分,已经足以摆脱“佛教”这一略显陈旧的“母胎”而振翅高飞,轮到佛教小说作为“接受者”接受现代小说的启蒙与反哺了。这百余篇佛教小说,因此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其一,文学的发展是需要民众基础的,这些小说从接受学的角度,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从知识分子向民众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其二,从文学史的角度,它提供了一个向来被现代文学史所忽略的创作群体,而随着佛教小说的发展,它也向外开放了一个现代小说少有涉及的寺院丛林以及广大普通僧伽的日常生活领域,能够深化我们对现代小说的研究;其三,这些佛教小说文本,生动反映了近代以来佛教界“人间佛教”等佛教革新、学僧群

体的涌现及现代诉求以及爱国和革命的人世思潮等重要变化,对丰富当代佛教文学的建设乃至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积累了优良传统和珍贵资源。

## 二

如前所言,如果以现代小说的发展为参照,民国佛教小说的发展,呈现出同质滞后的特点。但整体上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考察,还是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发展脉络可循,在此归纳为过渡期(从民国初年至二十年代末)、发展期(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和开拓期(四十年代)三个发展阶段。

过渡期的佛教小说,充分体现了古代小说与“小说界革命”以降新小说的混合影响。民国初年的佛教小说,主要集中在1911年创刊的《佛学丛报》与1913年由太虚法师创刊的《佛学月报》中。台湾释东初法师曾在其著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指出:“我国佛教发行的各种刊物,首推民国元年之《佛学丛报》。”这段时期的佛教小说,从形式上明显可见晚清“类型小说”的影响;从内容上则又清晰可见同时期小说“救世说”的价值定位。陈平原曾列举周桂笙、黄小配、管达如等的小说观,归纳认为他们“把改良小说进而改良群治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上。……继起的理想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性质也颇为相近。”<sup>①</sup>对比上述两种期刊,都开辟了“小说专栏”,而且所刊小说绝大多数都明确标出了类型,计有理想小说、滑稽小说、寓言短篇小说、警世小说、科学小说、宗教纪实小说、导俗小说、寓意侦探小说、人生小说等等,几乎包括了晚清以降除言情小说之外的大部分类型。与之相应的是内容的“救世”倾向。晚清小说漠视情节、喜好议论、关注科学等特点趣向,在这批小说里一一呈现。如发表于《佛教丛报》创刊号、可谓民国以来的第一篇佛教小说的《社会鉴》(1911),便置于“理想小说”栏下,名为小说,实际通篇都是议论,意在戒贪戒痴戒嗔,最后说“社会人心读此当亦悚然思返乎,此作者之所馨香祷祝也。”“科学小说”《黄金与粪土同价》(1913)应系译作,写科学家发明了从地心无限开采贵金属的方法,主旨却在表达黄金价值丧失引发世界之乱,以及无限制开采可能致地球毁灭的严重后果。以上种种,几乎都可鲜明见到从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的影响。

刊于《佛学月报》1913年第2期的《寄生国》,置于“警世小说”栏下,是这段时期内艺术价值较高的一篇政治寓言小说。小说寄寓了僧人对乌托邦式民主共和社会的构想。1914年,随着《佛学丛报》与《佛教月报》因经费等原因停刊,佛学期刊凋零,佛教小说的最初尝试也告中断,随着1921年《海潮音》与《佛学月刊》创刊,才告恢复。这段时期,古代章回体小说、晚清新小说与“五四”白话小说交替出现,可以鲜明看出转型期新旧理念的碰撞。《佛学月刊》创刊号有两篇小说——《极乐世界游记》和《化魔记》,均置于专辟的“小说栏”,且置于所有栏目最后,可见对小说的自觉文体意识以及小说当时在佛教期刊中的非主流地位。其中,《化魔记》写佛徒于荆山降伏波旬的故事,弘佛之意明显。这体现了佛教小说开始从早期的参与社会建构向弘扬自身的定位转化。这一转化,在另一篇小说《牟尼宝》<sup>②</sup>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小说明确标明“寓意侦探”,多少受了福尔摩斯或程小青的影响,在内容上套用了佛教摩尼珠故事。譬如大侦探叫佛陀;徒弟或助手叫僧伽;仲生(万生)父母从乐村被逐,临走前舅父给予摩尼珠让其子凭此回村;仲生的门人和助手勾结外人乃至侦探野火化(耶和華)和木德模罕(默罕穆德)欲偷抢摩尼珠;最后仲生发现,佛陀乃是自己的舅父。另一种值得关注的是佛教小

<sup>①</sup>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sup>②</sup>一厂:《牟尼宝》,《海潮音》1926年第6期。

说的长篇复古倾向。如1921年《海潮音》第2卷第10、11期连载的文言章回体小说《西游演真记》。1923年《佛学汇刊》还连载有白话小说《归元镜演义》，写净土宗的成立故事。这篇小说被置于“导俗”栏目，也可见无论受晚清新小说还是古代通俗小说影响，其“宣佛”的宗旨是一致的。而复古的倾向在创刊于台湾的《南瀛佛教会会报》上体现得更远。从1925年至1929年，它连续连载了诸如《一念之差》、《玉壶水》、《并蒂莲》、《观音东游记》、《香火缘》等长篇文言小说，除了如前述宣扬佛教历史、轮回果报等佛理之外，还有侠义美眷忠孝礼节等类似《儿女英雄传》的内容。这种兴盛，与其远离大陆的“五四”现代文学思潮有关，反过来也多少能证明现代文学思潮对大陆佛教文学的间接影响。

和世界社会通俗小说的历久不衰一样，由于能契合读者的传统口味习惯，三十年代后类似的佛教通俗小说还有《二少年》（文言）<sup>①</sup>、《真西游记》（文言）<sup>②</sup>、《花萼荣悴记》（白话）<sup>③</sup>、《玄奘法师西行画传》<sup>④</sup>等。值得一提的是，大陆佛教期刊上发表的上述长篇小说，绝大多数只连载了部分甚至只有开头的两章就不了了之，但大多都曾在佛学书局以单行本发行。

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短篇小说（即强调情节的 fiction 而非强调故事的 short story），在这一时期不占主流，为数甚少。但刊于《佛教月报》1913年第1期（创刊号）、列于“滑稽小说”栏目的《一足显》值得一提。原因之一是，它不仅出现颇早，而且作者身份比较特别，是该刊的主编、民国以来影响最大的高僧之一太虚亲自所作。这不能不表明佛教对晚清小说的敏锐与重视；原因之二是，它是一篇质量不错的重情节而非故事的 fiction。可惜的是，这一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得到重视。所辑得的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新标点短篇小说，已经是10年后发表于《新佛化旬刊》1922年第12期的《放下屠刀》。但该作意在禁杀，用笔直白；另有发表于《佛化新青年》1924年第2卷第5、6合集的《觉话》（小说），旨在弘佛，同样文笔一般。

### 三

大致从1926年起，新文学对佛教小说的影响逐渐彰显，佛教小说进入发展期。发表于1926年《楞严特刊》2、3期连载的《海枯》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而同年另一篇小说《什么是宝？》<sup>⑤</sup>也颇有可取。小说以写景推进叙事，熟练地运用拟人、光色描写、环境渲染等，而且情景交融，节奏明快，并有机参与了小说结构的经营。发表于1929年第2期《慈航》杂志的《破衲》，则同样体现了纯熟的技巧。小说分四节，以“破衲”为线索，小说融对话、写景为一炉，短短的篇幅却有丰富的波折。写穿破衲的墨真与富家少年爱家的对话，爱家认为墨真过于消极，而墨真认为很多“积极”反而与世有害，包括学生白天演说晚上玩乐，此一转；爱家又好奇墨真为何穿得这么破。墨真借机告诉他要勘透其本相，爱家因此受到触动；最末一节很精彩，爱家告辞后看到镇上的喧嚣和得意。这一结尾，心理活动丰富，有不尽之致，又暗含婉讽，与叶圣陶的名作《潘先生在难中》有相似之处，而层次之丰富有过之。同年发表于《现代僧伽》的小说《我的师兄》，则另有特点。这篇刻画了一个省吃俭用资助徒弟上学的僧伽形象。小说以师兄给徒弟写信开始，通过我跟师兄的对话展开情节，写景既隔开不同时期的故事，又巧妙地对应人物的心情或烘托环境，也颇得现代白话小说之妙。

①叶盖尘：《二少年》，《佛学半月刊》1930年创刊号至1931年第24期连载。

②胡寄尘：《真西游记》，《佛学半月刊》1931年第25期至1932年第35期（未完）。

③顾明道：《花萼荣悴记》，《罗汉菜杂志》1940年第3—10期（未完）。

④《玄奘法师西行画传》，《同愿》1942年第3期至第12期连载。

⑤静观：《什么是宝？》，《楞严特刊》1926年第10期。

小说技巧的发展也扩展至结构。《佛学半月刊》1932年第41期发表的《复仇》，字数不多，却是一篇精巧之作。小说紧扣“复仇”，充分运用误会、悬念和惊奇。一开始写“上海中日之战的经过，不觉有半年了。一般人似乎渐渐的把这件事淡忘了。”然而，“沉默谦恭的老赵”却把拳头重重地击着桌子：“此仇不报，还成个人么？”大家都觉得诧异，觉得他肯定疯了。小说巧妙利用了误会、欲扬先抑、心理描写、悬念惊奇延宕等手法，层层推进，又紧扣“疯了”的疑问。问是否为战事之仇，但老赵说，“哪里止，大着咧。”然后提越王勾践的复仇，最后原来是“贪嗔痴慢，夺我们的妙性之光，破我们的涅槃之宅，这个仇恨”。末尾再次呼应：“这个时候，大众不当老赵是个疯子了。”正是峰回路转，卒章显志。

在佛教小说从形式和技法上充分吸收现代白话小说成果的同时，短篇小说数量明显增加，题材也日益走向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中，又以三个主题为核心。其一自然是宣扬佛理。如《什么是宝？》写父亲批评啃老的儿子，以赤子纯真隐喻佛法视为人生之宝；《破衲》将佛家的宁静与世俗的喧嚣欲望进行了对照和辩诘；《复仇》则以悬念而诙谐的笔调，写戒“贪嗔痴慢”；此外，《天伦的回想》<sup>①</sup>详写女人从怀胎到生产（难产）的不易，由于菩萨保佑才幸免于难，提出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如上等等，都各有值得称道之处。这类小说1933年前出现较多。其二是皈依和出家主题。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则有《了悟的青年》<sup>②</sup>、《偷奖券》<sup>③</sup>、《孤儿》<sup>④</sup>、《铁箱》<sup>⑤</sup>、《“咚”！》<sup>⑥</sup>等。这类小说主要集中于《正信》和《人海灯》两种杂志，写出了不同人等选择皈依佛门的经历，无意间也为那个时代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状态立此存照。

其三是写佛门生活。首先是塑造了一些佛门人物形象。代表性小说除前述《我的师兄》外，《疯子和尚》<sup>⑦</sup>值得一提，塑造了为放生甘愿挨打，并立意改革放生办法，远途放生和宣传的“疯子和尚”慧海；此外还有《姓王的》、《守戒的人》、《他也算是做了个僧青年》等。其次是写佛门百态。其中，《劫灰》<sup>⑧</sup>是一篇优秀的小说。小说标明“作于九一八周年纪念之后”，写僧侣参加和尚护国军，对开杀戒的犹豫和思考、在残酷的战争“世道”中的动摇以及最终的坚定。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写景、对话、心理活动、梦境等，并回应了世人对他们“不懂得世道”的讥讽，无论技巧还是主题都颇有可取之处；《法会的前夜》<sup>⑨</sup>则是一篇精彩的讽刺小说，围绕着即将要举行的法会，两个执委和一个新闻记者勾心斗角，精心算计，把佛门中人的贪婪揭示得淋漓尽致，可谓自揭其短。此外，尚有《佛学半月刊》1931年刊发的系列短篇佛话小说《毒蛇》、《忏悔》等，《人海灯》1934年刊发的《假和尚与假警察》、《可怜虫》，《人间觉》1937年刊发的《我忏悔啦——末世比丘与信信优婆夷》、《真不知谁可惜了》等。这些小说，有批评有思考，风格或清新或凝重或诙谐，体现了佛教小说正在走向成熟。

#### 四

随着抗战的爆发，大致从1938年开始，佛教小说也开始告别30年代的日常生活之“轻”，进入沉潜和开拓期。

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与战争有关。前述小说《劫灰》就正面涉及了“八一三”以及僧侣从军的话题，

---

①姚悔庵：《天伦的回想》，《佛学半月刊》1933年第61期至第68期。

②张国威：《了悟的青年》，《佛学半月刊》1931年第12期。

③观仁：《偷奖券》，《正信》1934年第3卷第22期至24期。

④觉民：《孤儿》，《人海灯》1934年第1卷第2、3期。

⑤悦西：《铁箱》，《人海灯》1934年第1卷第11、12期。

⑥子华：《“咚”！》，《正信》1937年第10卷第15期。

⑦西西：《疯子和尚》，《海潮音》1932年第13卷第8号。

⑧普思：《劫灰》，《正信》1933年第2卷第1—7期。

⑨呼吁：《法会的前夜》，《正信》1934年第4卷第1、2期。

但尚属个别。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在佛教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刊载于1938年《金刚》创刊号的小说《要在火坑乘凉》，写年轻的金光明居士被日本军活活烧死，临死前他笑容可掬地说“今天我要在火坑里乘凉去了”。《虚无和尚》<sup>①</sup>塑造了一个来历神秘、智勇双全、精通多国语言、为军队从日本人那里刺探情报的高僧，到引发日军怀疑时，他则飘然而去，加入军队。《一个小沙弥的故事》<sup>②</sup>也是出色的短篇。同行的小沙弥惹人爱怜，他原来庵里的九个人都被日本鬼子杀死了。他从枪林弹雨的沦陷区逃出来，到后方去读书。小说落脚于要重视儿童教育，以“他可能是未来的法师”作结。《丁零》<sup>③</sup>写在印度人开办的贵族学院上课的森特，偶然认识了仆役的孩子丁零，知道了他坎坷的身世：父亲出身优渥而于“九一三”后从军，又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后在武汉会战中战死，母亲也随后去世，留下三个孤儿。小说叹息为国牺牲，在胜利的今日，是多么光荣而可怜的。这为抗战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少见的视野。小说写丁零却不由其写起，先写景和环境，再写森特，而森特的无谓的烦忧又与丁零的坎坷作对照，由森特的惭愧反衬丁零，结尾处再次抛开人物，通过写景传达了对丁零的叹惋和同情。

发表于1940年的《行者之泪》<sup>④</sup>可以称得上扛鼎之作，足以证明佛教小说不断演进的实绩。这篇小说写两个以不同形式为祖国参加战争并牺牲的僧人。由三封信和一个跋语构成。三封信都有标题，如“一个奇迹”、“太阳没啦”、“何时归去看故国烽火，看友人新墓”。第一封信是高烧之中、面对着敌人诱降的明慧写给以前的挚友空轮的，既表明了自己的爱国之情，也表明了对空轮投身日本人的不解；第二封信是友人写给空轮的，交待了明慧之死并表达了及时行乐的观点；第三封是空轮写给友人而未发出的，解释自己做地下工作、为祖国获得很多情报、以及时刻在敌人视线之下的复杂心情。跋语则是交待空轮因脑膜炎去世，这几封信捡自其遗物，既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为了让祖国看看佛弟子在抗战中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其中，“疯子”明慧临死前发出了“世界上没有了我的祖国，等于太阳没啦”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无论是主题思想、结构设计、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关系、命运的巧妙补充与穿插，叙述多视角的自然转换，都足以跻身40年代最好的短篇小说。

在关注战争的同时，佛教小说更深入地介入广阔世界，也有了更具“现代性”的自觉思考和追求，一个较为集中的主题首先是面对当时较为普遍的政府强占寺产现象，呼吁僧侣团结抗争。《殉教者》<sup>⑤</sup>刻划了一个素禅和尚，尽管预先得知自己因抵制迁寺而被密谋下狱，却以宗教革命领袖马丁·路德为榜样，甘愿殉教；《悟禅》<sup>⑥</sup>写有抱负的和尚悟禅，学成回来，自己的小庵被吸鸦片烟的师父把田产卖掉了大半，他要重振小庵，但地方豪强一心要拆庙霸占，悟禅第一年把本来准备修建庙宇的稻子全部抵给人家，但今年又有士兵来抢稻子并将庙贴了封条，悟禅只得放弃小庵外出挂单。小说通过村人的议论出之，最后说“唉！做个和尚，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了！”视角精巧，意蕴丰富。《团结》<sup>⑦</sup>写西来信奉自扫门前雪，辛苦一辈子积累殿宇田产，却于一夕之间被充公强夺，自己也被气死，指出僧人要组织佛教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大兴教寺》<sup>⑧</sup>则更具代表性。小说写年轻的和尚善慧临危受命，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扩大自身影响，成功摆脱了寺产被霸占的命运。小说穿插了闽学院求学、“八一三”参加了僧侣救护队、开放寺院收容沦陷区的难民并成立大兴山救国宣传队、公演“人间佛教”话剧等时代感强烈的重要事件，最终发出“唯有在伟大的时代才能看出我们佛教的精神，只

①凌度年：《虚无和尚》，《狮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5—7期。

②寂静：《一个小沙弥的故事》，《大雄》1942年第3期。

③幼芬：《丁零》，《正信》1946年第12卷第7期。

④暮笳：《行者之泪》，《狮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⑤燕平：《殉教者》，《海潮音》1942年第23卷第11期。

⑥自强：《悟禅》，《佛教文艺》1943年第1卷第1期。

⑦震寰：《团结》，《觉群周报》1946年第1卷第5期。

⑧映平：《海潮音》1945年第26卷第12期。

有佛教的精神才能把人民从劫火中救出来!”的豪言,是一篇主题内容俱佳的现实主义小说。

上述小说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往往不约而同地强调青年僧人的力量。同样的趋向表现在青年僧人的“求知”主题之中。《雪痕》<sup>①</sup>写年轻的和尚雪尘一直被师傅役使,在接到戒兄的来信后,终于鼓起勇气,拒绝师傅让他当家的诱惑,在大雪天走上了参学的道路,雪地上留下了他出走的足迹。《慧炬》<sup>②</sup>主题类似,写在学戒堂求学的了悟从戒兄那里得到佛会教立中学刚成立招考的消息,在师傅的亲情与旧思想的束缚面前,他最终坚定了争取自己权利的决心。《激流》<sup>③</sup>写有了自由平等意识的僧青年对刻板的住禅堂生活的抗拒,重点写了三个僧青年不同的价值取向。《重逢》<sup>④</sup>则写了一个离开僧学堂考入普通中学,可惜没能经受外界诱惑,学无所成的僧人。此外,《歧途》<sup>⑤</sup>、《激流》<sup>⑥</sup>、《慧三法师》<sup>⑦</sup>等小说,或写学僧迷途知返,或写潜心读经的僧侣,也丰富拓展了同一主题。因而整体地看,这一阶段尽管也不乏《歧路》《或人的悲哀》《一个青年的忏悔》《孤峰零雁记》《黑夜中的泪痕》等表达个体感伤抒情、带着郁达夫式颓废色调的小说,但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都不能与关切现实类的佛教小说相比。较之三四十年代小说不拘泥于佛教丛林而体现了鲜明的参与意识;不只是泛泛提出问题而是积极于行动及解决问题;为佛教小说注入了一股青春昂扬之气,与新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写作同声相应,足以作为现代小说史的一个补充,标志着佛教小说境界的开拓和整体水平的提升。

## 五

佛教小说的上述成绩,是在不断地与传统偏见作斗争的过程中,在自身理论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尤为难能可贵。过渡期的佛教小说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少有理论研究。《佛学丛报》基本未涉及小说理论,发刊词凡例“小说”项只是简单地说“义取警世间涉因缘凡海倡乱之文概不登载”。与之成对照的是对小说的偏见。如1921年《西游演真记》绪言用很长的篇幅列举了当时对小说的误解,如“小说者,妄语绮语之业也。或毫无事实,为全分的妄语;或略有事实为多分少分的妄语。或宣演淫邪,为污秽的绮语;或铺张事实,为优美的绮语。要之为妄语绮语则同。夫妄语绮语者,大戒也。作小说而犯大戒,是岂佛教之徒哉?”<sup>⑩</sup>同年的《佛化东盛记》<sup>⑪</sup>绪言也强调自身“至于其中一事一言,皆本正籍,不加半点虚构,绝非如普通小说之纯造妄业比也。”1926年的《牟尼宝》篇末为了解释为何作此小说,特意搬出了《法华经》做挡箭牌:“小说是连带三业的。但是这种意思已为《法华经》上所有。不过著者作一种演释的说法罢了。”<sup>⑫</sup>普遍的辩解,可见时代施于佛教小说创作者的压力。由此也可见这一时期有限的佛教小说的通用策略:一是强调真实;二是对不够真实的则强调“皆本正籍”。如上述章回小说《佛化东盛记》,即在“皆本正籍”的旗号之下,小说开头就写一位100多岁的时候,役使鬼神,神通广大,甚至能够到河边洗涤自身的脏器。吊诡之处清晰可见。

从1926年开始,新文化运动逐渐显示了其对佛教小说的影响。例如1926年创刊的《楞严特刊》

①文涛:《雪痕》,《闽南佛学院》1943年特刊。

②震寰:《慧炬》,《正信》1946年第12卷第3期至第7期。

③⑧震寰:《激流》,《佛教公论》1947年第19、20期合刊。

④能培:《重逢》,《正信》1947年第13卷第8、9期。

⑤普莲:《歧途》,《中流》1943年第2卷第7、8期。

⑦林庵:《慧三法师》,《佛教文摘》1947年第1期。

⑩寂照编述,慧圆参校:《西游演真记》,《海潮音》1921年第2卷第10期。

⑪萃哉编述,慧圆参订:《佛化东盛记》,《海潮音》1921年第2卷第11期起(未完)。

⑫一厂:《牟尼宝》,《海潮音》1926年第6期。

第2期在“本刊投稿例”第一条就指出:“本刊欢迎投稿,无论白话文言论说诗词小说,凡关于阐扬佛理及有新文化者均一律欢迎。”其中“新文化”的地位与“阐扬佛理”赫然并列;其所推出的小说《海枯》,编者直陈是“创作新文学”的小说,是“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是一种“有主义的艺术文学”;佛教领袖之一太虚法师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与鲁迅1929年的一次偶遇,说“那时我的学生芝峰大醒亦幻等已在看鲁迅先生的书,学生已受了他的文学影响,但我却未见过他的书。”<sup>①</sup>当然还有曼殊上人以其特殊才情对部分僧人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传统偏见的力量也不可小觑,《楞言特刊》1927年第14期的一篇论文,即对崇拜欧美哲学而鄙中华文明可言的“革新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sup>②</sup>

佛教小说的不振,源于佛教文学的凋蔽;再进则又源于佛教内部“不立文字”观的误导。从1931年,佛教界开始了自觉的清算,使“佛教文学”的地位得到确立。<sup>③</sup>佛教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也随之进入了蜜月期。《现代佛教》1932年第7期刊载了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弘法社刊》1933年第24期的一篇文章《新旧文学之比较》则对新文学及胡适的文学观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肯定;影响所至,1934年著名的通一法师也学步沈从文的《月下小景》,写了小说《马王》<sup>④</sup>,丰子恺则是《海潮音》的常客;抗战之后,双方联系进一步增强。1940年郭沫若、林语堂、老舍等均应邀在汉藏教理院做了“文学与佛教”主题的演讲,并在佛刊《观音》上进行了宣传。其他如田汉、夏衍、梁实秋、欧阳予倩等也都在佛刊上著文。但佛教小说毕竟只是佛教文学的一支。相对佛教文学的兴盛,专门的佛教小说研究为数甚少,代表性的只有张健华的《短篇佛化小说之我谈——为佛界报杂主办进一言》<sup>⑤</sup>、《谈小说有益于弘化》<sup>⑥</sup>两篇。前者开篇强调小说的作用意义:“小说一门,感人至深,劝人之切,有非笔墨所能竭其万一,良以借抽象之理论行具体之事实。至今为感动者,性之所发,情之所向,虽患难生死,不为或移也。”也指出佛教小说不够兴盛的现实:“查我国近代弘化报杂,为数不少,惜其内容,大都专阐一宗一派,独事研精究远,效力止及上根。引导初机,殊非易易。……但近代弘化报杂,对于短篇佛化小说,尚付阙如。”文章建议“开辟专栏,广事征稿,务以深入显出笔墨,将人生学佛要义,学佛概念,真正人生,举及佛学教义,熔冶小说之内。”同时,也指出了佛教小说宜短不宜长的原因:“且小说体格,不以中篇长篇,而以短篇为适合者,盖以凡夫俗子,初机尚浅,学问无根,突以中长各篇阅之,无异扁舟入海……”其中谈到《佛学半月刊》之所以去掉小说栏,稿件缺乏为一主因,也可为佛教小说总体不振之实例。后者内容总体相近,值得一提的是其指出,“论者幸勿以小说文字近诸绮舌,学佛人不应出之。要知动人信佛功大,绮舌导人事小,功罪相衡,轻重自明。以绮舌为方便,引入人佛为究竟,虽绮舌,容何伤。”较之二十年作者普遍视“绮舌”为禁忌,体现了时代和理念的根本变化。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专门从佛教小说文体本身、尤其是从现代文学层次的深入探索。

缺乏理论提升的佛教小说探索是孤独的。这可以从1937年《人间觉半月刊》第12、13期合刊推出的“曼殊纪念专号”瞥见。近30篇文章中,以肯定态度专门谈其小说的只有一篇《谈曼殊上人的小说》,肯定其文采、人物、写景与写情;其他间或谈到时也往往批评其对一般青年及僧人的不良影响。“卷头致词”则直陈其作品“在圆领方袖的同袍中间,这是当作‘雪夜闭门读禁书’似地在读着。”同是1937年,在上面提到的《马王》篇末附注中,通一也表明“这两年来我对于纯文学作品似乎很扫兴,将来想从佛教经论上做点功夫”。直至1948年还可见对小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少年人爱读小说,为通

①太虚:《忆鲁迅先生的一面》,《海潮音》1943年第24卷第7期。

②鹏声:《对于现在文学家之警告》,《楞言特刊》1927年第14期。

③参见谭桂林:《“五四”后中国佛教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④通一:《马王》,《人海灯》1937年第4卷第2期。见篇末附注。

⑤张健华:《短篇佛化小说之我谈——为佛界报杂主办进一言》,《弘法社刊》1933年第24期。

⑥健华:《谈小说有益于弘化》,《觉有情》1942年第58、59期合刊。但标明“健华旧稿”,根据内容,实际写作时间估计与前篇相近。



常习病,但小说最能使人惹起小说中之生活思想,而不免入于歧路。与其读小说,不若读古人传记之较有益于身心。”<sup>①</sup>在上述背景下,佛教小说在40年代取得如许实绩实属不易。究其原因,当与僧众长期面对国内严峻现实的思考,“人间佛教”的理论提倡,以及文学创作水平的整体进步相关。从1934年第1期开始,一直举大乘佛教的《潮潮音》正式推出“人间佛教号”,在太虚的带领下,从国政思潮、社会家庭、出家生活等全方位进行动员,“吾辈佛徒欲拯生民于涂炭,自宜随机利导,任何主义,等量齐观,庶不至障碍丛生,触途成滞。出家僧尼,寺院群居,一切物品,认为共有,日常生活,免其顾虑,住持佛法,以与各种学术团体,分途并进,同负历史的使命,以创造文化贡献人间”<sup>②</sup>。这一倡举,无疑极大开拓了年轻僧人思维。而对小说的影响,从1933年《劫灰》中僧侣面对国难和社会“不懂得世道”之讥,解开了“参加护国军开杀戒”的理念困惑;到10年后小说《他的新认识》<sup>③</sup>也从“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的大乘精神汲取到积极养分;以及《大兴教寺》中僧侣主动排练“人间佛教话剧”,均可见其草蛇灰线。更宏观地看,40年代介入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勃兴,以及那种昂扬进步的精神,均可在此找到思想根源。

综言之,缺少专门理论指引的现代佛教小说的发展,是一个缺憾与成绩并存的过程(比如,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非专业创作也导致作品免不了良莠不齐)。本来,随着创作的迈向成熟,佛教发展出自身的小说理论话语也未可知,但这种可能性被1949年后的时局剧变所截断。即便如此,通过上述实证研究也可以看到,首先,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影响,是全社会性的和“润物细无声”的,即便是相对封闭的佛教内部,事实上也深受这种文化风尚的影响,这一结果无疑能提振我们对文学发展的意义的自信。其次,开放兼容,是文学样式发展的不二法门。佛教以及民国佛教小说的开放性、参与性、包容性乃至成熟度,也许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认识。晚清或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已经把时空拓展至港澳台等地区以及鸳鸯蝴蝶派文学,但上文表明目前在本土内部其实还存在着可挖掘的盲点。其三,关于民国现代佛教小说的创作及理论的初步梳理,既能深化我们对佛教生活以及佛教文学的认识,也可以为当代佛教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和思考。以上几点,正是本研究所指向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陆 林)

## A Lonely Exploration and Journey: A Review of the Creation and Theory of Buddhist Nove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Zhi-qua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reation of Buddhist novels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studies on such novel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div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ist novels into three periods: initial (1911—1928); intermediate (1928—1937); and final (1938—1949). We also give a diachronic survey to the relatively inadequate theoretical studies on Buddhist novels and analyze the reason why there was such a big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reation of Buddhist novels and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m. All this is intended to explore a new area for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Buddhist novels; Buddhist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①恒智:《看小说不如读传记》,《佛教文摘》1948年第5集。

②臧贯禅:《佛教需救社会》,《海潮音》1934年第1期。

③圣缘:《他的新认识》,《闽南佛学院》1943年特刊。